

T5.06

昌乐党史资料

第一辑



中共昌乐县委

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印

前 言

本期《昌乐党史资料》为革命回忆录专辑，共收入革命老前辈回忆和撰写的文章十篇。这些文章通过革命老前辈的亲身经历，深刻地再现了中共昌乐地方党组织的建立、发展和斗争活动，以及昌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创造的英雄业绩。我们编印这期《昌乐党史资料》的目的，在于积累资料，广泛征求意见，为编写《中共昌乐地方党史》奠定基础，同时也为当前正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生动的教材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许多为昌乐人民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老前辈积极贡献资料，一丝不苟地修改文稿，对他们这种为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，我们深表敬意。

由于我们经验不足，水平所限，编辑工作中难免出现错误之处，恳请老前辈、各级领导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目 录

回忆解放前后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	赵西林 (1)
尧沟党支部在昌益寿潍四县境内的活动	党史办 (50)
入党前我和党的关系	<u>刘焕斗</u> (60)
八路军游击队第二十九大队组建及活动情况的回忆	庄少云 (66)
回忆参加二十九大队前后经过	李洪奎 (90)
三下昌乐两打高崖	李洪奎 (97)
虎穴攻心斗伪顽	张悲侠 (106)
一九四五年昌乐县的政权建设情况	赵功德 (124)
回忆边沿区的斗争	刘兆吉 (127)
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	何子健 (137)

回忆解放前后

昌乐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

赵 西 林

（一）昌乐地区早期党的工作

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二年，是昌乐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时期。一九二七年十月，昌乐地区党小组正式成立，其成员有孟繁锷、刘存山和我。党小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：在昌乐地区发展党的组织，团结联系农民群众，领导教育农民，反对苛捐杂税，反对土豪劣绅，反对军阀战争，跟敌人开展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，减轻人民负担。我们这个党小组直属潍县县委领导。县委为了加强对昌乐地区工作的领导，曾派王全武同志来昌乐对我们进行具体帮助。他来到昌乐后，在北展街西头的湾东沿赁了李升平的一所房子，开办西药房，以此作为合法职业掩护，开展党的活动，指导昌乐地区党的建设工作。我们以赶北展集的机会，到药房开会研究工作。

那时，我们党小组和中共潍县县委之间，完

全靠着政治交通员姜公璞来联系。县委委员王全斌也常到昌乐巡视工作。姜公璞是潍县大寨人，虽出身地主家庭，但干革命立场坚定，有胆有识，工作积极，不怕牺牲。他对党忠实可靠，勇敢机智地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。他父亲很顽固反动，得知他参加革命后，便到潍县官府去告发。当时潍县反动政府曾张贴布告，画出图象，悬赏捉拿他。从此，他便与家庭破裂，脱离了父子关系，成为两个阶级的敌对关系。他经常住在我家（昌乐赵家淳于）、杨家淳于及北李家河，一心投靠革命，出色地完成政治交通员任务，向我们传达县委的指示。我们本着县委的指示，结合昌乐的实际情况，研究布置开展工作。

随着革命斗争形势和建党工作的发展，一九二八年上半年，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，在昌乐党小组的基础上，成立了中共昌乐中心区委。其领导成员是：孟繁锬、尹志刚、刘存山和我，由孟繁锬任区委书记。我们仍受中共潍县县委领导。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在昌乐发展党的组织，有党员三人以上的村建立村支部，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，反对土豪劣绅剥削压迫，反对军阀战争，教育农民用拖、抗、罢的办法，反对官府加在农民身上的财政经济负担和壮丁训练。

为了掩护党的活动，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，

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都必须有个合法的公开的社会职业。孟繁锬经过多方争取，获国民党县政府批准，在北展街建立了一所小学，并担任校长。这是昌乐城外唯一的一所高小。我开了个“华兴成”油房。我们利用这些合法的社会职业，掩护来往同志和聚会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。

我们曾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例如组织贫农积极分子，特别是进步青年上夜校，通过这些合法的组织形式，宣传共产主义、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党的主张，联系党外群众，扩大党的影响，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要求。再如利用社会上流行的“当会”办法，搞“经互会”等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，以利党员聚会，团结群众开展党的工作。参加“经互会”活动的，都是经过选择的、有觉悟的贫雇农和进步青年。通过这些合法群众组织，秘密地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发现培养积极分子。对那些觉悟高、有入党要求，具备入党条件的，就吸收入党；对一些不具备入党条件的，就吸收他们参加共青团，扩大党的外围组织；不够共青团员条件的，就作为党外同情者。

一九二八年，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。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，全国的革命形势起了新

的变化。工农红军的壮大，苏区的扩大巩固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之间的矛盾，对我们的革命发展极为有利。一九三〇年，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李立三同志，推行一条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路线，只看到新军阀暴发战争，我们的红军大发展，苏区的扩大巩固，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，而不承认敌强我弱，主观的要红军攻打城市，要群众只要大干，不要小干，革命就一轰而起，影响全国革命的发展。一九三一年王明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，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“左”的错误观点。王明的“左”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达四年之久，使我党遭受了重大损失。为了更有利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，苏区红军必须要有飞机，因此，应在党员中发动捐款买飞机。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为了响应这一号召，便在短期内募集了一百二十元现大洋，派政治交通员姜公璞、秦立峰带款往潍县县委去送。谁知他们从我家走后，行至隋姑山，姜公璞被吴家庄一个姓刘的坏蛋开枪打死在隋姑山下。他身上带的捐款也被全部劫去。姜公璞同志的牺牲，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。

李立三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，对我们昌乐党组织也有影响。为了准备组织武装起义，我们昌乐中心区委于一九三〇年又吸收了一位具有

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刘焕彩。他是昌乐东耿安人，与孟繁锬是亲戚。他原在冯玉祥部下当团长时便入了党，后因暴露身份才不得不跑回家来。经过党组织对他了解、审查，吸收他参加了中心区委的领导。这个同志很有活动能力，并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。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，他在本村东耿安开了个“旭日烟社”，做土制烟卷。烟卷的牌子叫“旭日”，意思是旭日东升满地红，即未来的中国是红色政权满天下，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昌乐中心区委自吸收刘焕彩参加领导后，便为昌乐党组织重视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当时我们区委的其他领导成员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，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、开展武装斗争、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等重要论述。我们只是在现实斗争中有一种朴素的认识：敌人为什么能统治我们，镇压群众，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；因此，我们也必须搞到枪，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。那时，也不重视武装群众，只由共产党员单枪匹马搞枪支，组织武装。那时山东土匪较多。为了搞到枪支干革命，一九三一年，我们让刘焕彩通过关系，把共产党员杨勋普打入当地土匪王小孩那里，摸清情况谋取其枪。有一天晚上，杨勋普趁

王小孩熟睡之机，把他打死，缴获两支短枪。从此，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才第一次有了向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武器，两支短枪闹革命。

一九二七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国共两党分裂后，共产党领导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，实行土地革命。中央苏区实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。山东党处于白区，党的口号则是反对苛捐杂税，打倒土豪劣绅，解除人民政治上受压迫、经济上受剥削的痛苦。潍县茂子庄有个恶霸地主、国民党员王全干，非常反动，曾勾结官府捕杀我共产党员。中共潍县县委委员王全斌（与他同村），就是他勾结敌人杀害的。潍县县委为了除掉这个土豪恶霸，便组织昌乐和潍县的几位同志，用从土匪王小孩那里缴获的两支短枪，把这个坏蛋击毙在他自己的烟地里，除掉了一霸，支持了群众，为死难的王全斌同志报了仇。

这时，昌乐淳于乡民团团总王士林，发动地主、富农买土造步枪“防匪保安”，其实是想扩充自己的力量，称霸一方，保护地主豪绅利益。在他的强迫命令下，十几个村子买了三、四十条土造步枪。为了夺取更多的枪支干革命，我们便布置党员暗中掌握这些枪支。打土匪，地主富农

子弟不敢去，我们党员去，以便熟练地掌握这些武器，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时使用。后来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暴发，我们拉抗日别动大队第十七大队时，这些枪就被我们拿到手了。

李立三路线对我们昌乐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，但那时昌乐地区的党组织是一直向前发展的。到一九三二年时，昌乐地区在中心区委领导下，共建立了二十几个村支部，党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人左右。当时，有许多工作开展得好的支部，如耿安支部，几乎半公开，有“小莫斯科”之称。该村不仅有党的组织，而且还有共青团的组织。那里的“旭日烟社”，青年工人大部分是共青团员，政治生活十分活跃。他们学唱《国际歌》，读马列主义小册子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
一九三二年，王明掌握中央领导权，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路线，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武装大暴动。山东党组织要在这年的八月举行武装暴动，大规模的暴动地点为广饶、沂水、益都、胶东等地。我们昌乐中心区委也执行了这一指示，召开了几次第五区的支部书记会议，研究暴动的准备工作和暴动后的行动计划，决定八月十八日晚在西黄山集合，举行暴动，命名“青龙山起义”。当时参加者有三百多

人（包括临朐的一部分）。由于八月十八日这天益都县的暴动失败了，我们得知这一消息，经过研究分析，又得到上级指示，所以才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。参加暴动的同志当夜回到各自的原地。

这次大规模的集合尽管是在夜晚秘密组织的，可是已经暴露了目标。敌人虽然没有当即采取行动，但时隔不久就对共产党实行了大逮捕。山东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时，昌乐地区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的摧残。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反动头子，亲自带领反动军警到处逮捕共产党员。我们的中心区委书记孟繁锬被捕去了，小解召共产党员刘次元被捕去了，敌人逮捕刘焕彩、杨勋普时他们乘机逃避未被捕去。其他未被捕去的同志转入地下，更加隐蔽地进行斗争。我们暗中串联，坚持与敌人展开秘密的斗争，侦察敌人的动向，稳定党员的情绪，教育党员坚定立场，不动摇、不妥协，与敌人斗争到底，争取胜利。这样的恶化环境，经过半年的时间才缓和下来，我们对党组织进行恢复整顿。这次敌人对我党组织大破坏，昌乐的共产党员除张太岩外逃而后叛变外，其他党员没有一个妥协外逃的。大家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和敌人进行斗争。

（二）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的前前后后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发生，日

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，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。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，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发布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，要求国民党当局全部释放在押的政治犯。山东在押的政治犯，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才全部释放。孟繁锬一九三二年八月被捕，押在济南，后来转到益都的省第四模范监狱。国民党释放他时，要家中找人保释。接到通知，其胞弟孟千里在党内联络同志，我们便组织了七八个人去益都保释孟繁锬出狱。

孟繁锬获释后，我们开了几次会，研究组织抗日武装。这时，虽然国共合作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卖国独夫蒋介石制定了一条防共、限共、溶共的反动政策，地方反动势力顽固派仍然认为我们不合法，极力反对我们组织抗日队伍。此时，厉文礼升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，在安邱一带活动。为取得合法名义，孟繁锬通过关系，去厉文礼部领取了一个“山东省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”的委任状。第十七大队由我任大队长，孟千里任大队副，孟繁锬任政委。经过一段筹备，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，大队在北展街宣告成立。大队下

设三个中队。一中队是大队的直属中队，孟千里兼任中队长，二中队队长是高家阳阜的高文然，三中队队长是张家河洼一个姓王的，大队要求这两个中队自己去扩军，组织中队。以后，一中队发展到一百多人，二、三中队没有拉起人来。

日本侵略军进入黄河北岸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一枪未放，把山东三千五百万人民抛给日本侵略者，带领他的五万大军逃到河南。我们趁机拉队伍，扩充力量，和日本帝国主义打游击。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动政策下，各种反动组织和县区乡政权仍然压迫人民，破坏抗日。他们打出蒋介石提出的政府统一、军队统一的口号，对抗日别动队处处限制和破坏。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逃出昌乐城，把张天佐、荣光治、孟庆华指挥的武装编为三个大队，还建起了区中队和乡分队。他们人枪马全。随便筹粮筹款，把我们抗日别动队十七大队视为不合法。我们十七大队按红军办法，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是人民的子弟兵。我们一无饷银，二无薪金，和人民同甘共苦，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吃什么，团结发动群众，实行艰苦抗战。群众只看到我们吃粗饭穿破衣，缺乏真正的了解，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多方造谣破坏，制造摩擦，我们的队伍发展很慢，有一次，我们到厉文礼的司令部要

弹药枪支和粮秣，他们给写了信，让我们到王金岳那里去取。我和孟祥林到唐吾街会见了王金岳，他说得很好，他说，你们抗日别动队的防地必须在最前线，你们的给养由县政府统筹解决，保证供应，答应给粮给款，但以后粮款皆不给。我们的队伍先后在北展、孟家淳于、赵家淳于和大柳树以南的地方活动，自筹给养，开支的经费分文没有。地主豪绅顽固派勾结一起，处处破坏我们的活动，使得群众不敢接近我们，给我们十七大队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

一九三七年旧历除夕，我们把队伍开到花园，这里是抗日前线。八区区长赵承卞带领他的区中队，全副武装，和我们搞摩擦。我们避开摩擦，在董良君同志家里刚吃过晚饭，日本鬼子从潍县城出动，进驻了大柳树。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敌强我弱，打进去不能取胜，决定打一场扰乱战。我们部队分成两个战斗组，分别在大柳树东岭上和村西南放枪鸣炮扰乱敌人整宿。敌人不知虚实，未敢出村，但枪炮齐发，消耗弹药不少。战斗结束，当夜我们把队伍开到孟家淳于，同志们风趣的说，过了一个战斗的春节。

春节以后，日寇进驻乔官街，淳于乡的顽固分子乡长赵信增、乡队副路九璫、保长孟兆岳向各村要款要粮，鸡猪蛋菜，送给日寇，进行资

敌。我们得悉后，孟千里带领几个同志到孟广秀家击毙孟兆岳，击伤赵信增，打击了地方投降派的气焰，解除了群众的负担，做到了囚敌于据点之内。其后，地方投降派顽固分子对我们十七大队更加仇视，百般破坏，合作抗日完全破裂。十七大队在原防地驻不得了，只得移防别处。这时，刘汉三已在唐吾拉起抗日别动队第三十三大队，我们把队伍带到刘汉三处，与第三十三大队一起增强力量，共同抗日，继续扩军备战，建立一块和日寇打游击战的根据地。蒋介石的地方顽固派张天佐借口刘汉三手下有几个土匪，影响很坏，对第三十三大队百般刁难。我们两支抗日力量合并一起，张天佐感到与己不利，于是内派奸细，明施压力，千方百计要搞垮这支群众抗日武装。此时，原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已经逃走，国民党委任张天佐任县长兼第四区总队长。张天佐和地主豪绅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，统治了昌乐。

这时，我们得悉党在潍县拉起八路军鲁东游击七支队二大队，共产党员何凤池任大队长。我与孟繁锷、秦立峰、高文然、王洪福便去七支二大队，计划把抗日别动队十七大队拉到七支二大队合编。计划确定后，我回昌乐做动员工作，没等回到昌乐，部队就出了问题。张天佐用先发制人的手段，密谋策划消灭抗日别动队这支抗日队

伍，于三月末突然以“点名发饷”为名，要刘汉三把抗日别动队全部集中到北展小学。张天佐命令他的第四区总队包围了北展小学，亲自出面点名，然后下令收缴了抗日别动队员的枪支。刘汉三当场被扣，七个反抗缴枪的抗日战士当场被杀。刘汉三手下的张思昌早有警惕，用隐苙于衣袖当中的手枪向张天佐射击，没有打中，但打死了他的卫队长于介成。抗日别动队逃出来的同志有的回了家，有的到潍县参加了七支二大队。此后，在昌乐组织群众抗日武装被视为非法。张天佐与地主豪绅、汉奸投降派相勾结，形成了一股反动势力，他们奉行蒋介石的卖国曲线救国论，暗中投降日寇，把持了昌乐地区。

（三）八支队二十九大队的曲折战斗历程

“北展事件”以后，昌乐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刘次元、孟繁锬、王洪福、秦立峰、孟千里和我，都参加了七支二大队。一九三八年四月，七支二大队奉命东下黄县，与八支队合编后，我和刘次元到支队总政部工作，高文然在二大队任中队长，孟千里任中队副。同年五月，八支队奉命离开胶东地区西下，到了潍北。这时，昌乐的同志赶到部队驻地，要我和刘次元回昌乐领导开展

党的工作。我们接受了同志们的要求，取得司令部的同意，决定回昌乐。

回到昌乐，我们研究分析了形势，首先发动组织群众性的抗日组织“抗日救亡团”。这个组织发展很快，六月回来的，两三个月的时间，团员发展到近千人。群众不怕艰难困苦，参加“抗日救亡团”的积极性很高。我们在抗日救亡团中发展党员。这一阶段，是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。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刘智堂、刘继堂、徐培芝、尹宗礼等，都是这时期发展的党员。乔山前、下庄、上庄、解召、于家山前，万庄、朱刘、东庄，都建立了党支部。原有的支部也扩大了组织，开展了活动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张天佐还不敢公开对我们搞破坏，他明里限制，暗中破坏。我们面临的斗争对象是日寇、伪军和地方顽固派。

我们在组织抗日救亡团的基础上，再次建立抗日武装。这时，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在周村一带活动，我们派尹宗礼等人 and 八支队联系，说明我们要发动武装抗日，支队司令部批准我们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。我们请求八支队委任军事干部来领导，司令部派了庄少云、郭家瑞两个同志。二人八月到昌乐，庄少云任大队长，郭家瑞任大队副，我和刘次元负责